



陈思和——著

昙花现集

昙花现集

陈思和——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昙花现集/陈思和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08-13002-9

I. ①昙…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3398 号

责任编辑 舒光浩 薛羽

封面装帧 胡斌 刘健敏

昙花现集

陈思和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6.5 插页 4 字数 361,000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002-9/I·1380

定价 62.00 元

再谈对新世纪十年文学的理解(代序)

我在《对新世纪十年文学的一点理解》一文中曾经说过自己的写作计划,要进一步讨论当代文学的“中年危机”现象,但是在开了一个头以后,迟迟没有写下去。这过程中自己在认识上发生了变化。在去年6月复旦大学召开的“新世纪十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办者有意安排了两群不同年龄层的作家——一群是中坚作家:莫言、余华、王安忆、苏童等,另一群是当红的年轻作家:蔡骏、韩松、飞氲、张悦然、郑小琼等等,他们的创作涉及网络文学、惊悚小说、科幻小说、打工文学等方方面面,都拥有大量读者。当我看到这两个不同群体的代表性作家在同一个会场上发表自己文学见解时,原先的期待突然落空了。——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也是当代文学的审美观发生裂变的时代,当“重放的鲜花”一代作家大声疾呼文艺“为人民”的文学主张时,他们与50年代以来“人民”概念的理念发生了断裂,但同时,在这一代“重放的鲜花”派的作家后面,又发生了新的裂变:从1985年寻根文学开始崛起的新一代作家,以新的美学原则与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渐行渐远,出现了走向民间的新趋向。庙堂、广场和民间三种价值取向逐渐形成鼎立势态。我的许多同龄朋友们至今还沉湎于80年代的怀念之中,主要原因是在那个时代的多元裂变的文化走向中,我们正作为年轻的、朝气的群体力量迈向充满信心的未来。——我要插入这一段回忆80年代

的感触,是因为我原先一直以为:新世纪最初十年的文学状态中似乎也将出现一种文学和美学观念上的断裂:从目前创作力相当旺盛的中坚作家的创作中所获得的批判精神,与大众媒体文化孕育出来的文学新人的文学现象之间,将产生尖锐的对立。

学院派批评一直在提醒我们,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的、秉承了“五四”精神的巨大批评能量在文学创作中逐渐减弱,后继乏人的迹象似乎已经显明,而各种被媒体、书商、利益集团所支配的文化现象:媚俗、趋时、自我矮化、庸俗化、娱乐化等等愈演愈烈,它们借助媒体批评推波助澜,吸引了大量的青年读者。这样的断裂,与以往文学史上的每一次断裂都是由先锋运动推动社会批判和传统批判、催化主流文化发生新的蜕变的情况不同,仿佛是倒过来了,陷入了一种“危机”。这种文化上的危机,我隐约地意识到,我把它看作人的生理现象一样,如同进入了中年状态的身体,虽然成熟了,但身体的各种能量也开始逐渐衰退,常态的、稳健的、随波逐流的日常化现象逐渐取代了激进的、蜕变的青年先锋运动。因此,坦白地说,我在去年6月的国际研讨会上期待的是年轻作家们新的先锋宣言,期待着他们在孕育他们写作的环境中发出新的反叛主流的声音。我并不在意他们将站在什么立场上反对主流,而是希望通过挑战和争论来激活当前文学的超稳定状态,我期待的是我们的时代应该出现新的美学观念上的断裂和跳跃发展。事实上,这种断裂的可能性曾经在90年代出现过,如以韩东、朱文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们,如以棉棉、卫慧为代表的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尽管他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学理想都不一样,但是对于既成主流文化规范的否定和破坏则是相同的,可惜他们的声音还是太微弱。我这里所说的主流文化是综合了当前主流社会利益的各种文化力量,也包括了学院知识分子中间的某些主流的声音。

但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毕竟出现了某种不可忽视的迹象:首先是新媒体形式的快速更新与发展,使原先的体制捉襟见肘、愈显笨拙;其次是由于庙堂、广场与民间三分天下的界限日愈模糊,相互渗透,很多原则性的大是

大非都被混迹于各种民间话语之中,遮蔽在藏污纳垢之内,精英的批判力量是通过民间形式而不是知识分子形式来表达,很难被分辨出来。这十年中最优秀同时也是最具有现实批判力量的文学作品,如贾平凹的《秦腔》和余华的《兄弟》都曾经被一些以精英自居的文学评论家所轻视和否定,他们口口声声高喊当代文学缺乏批判精神,却看不到如此全面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存在于自己的眼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位?这就涉及当前学院批评的一种与生俱在的缺陷:观念脱离了实际,成为一种抽象的、僵硬的、教条的精神原则,比如有些批评家在批评《兄弟》在叙事上所含有的戏谑、讽刺、甚至胡闹的艺术手法,认为这与严肃批判的内涵是不相容的,其实反过来问:戏谑、讽刺甚至闹剧式的艺术手段又有什么不好呢?这不就是来自民间的喜闻乐见的传统手法吗?又有些批评家在批评《秦腔》时见怪于它过于渲染人体的下半身与肮脏的排泄物,但我们依据巴赫金的民间理论来看,这根本不算什么,恰恰是象征了底层民间的旺盛生命力。那种戏谑、闹剧似的手法 and 关于人体下半身的描写,本身就是民间的文化成分,看不到这一点和不认可这一点,那就看不到或者感受不到这些作品文本所隐藏的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作为知识分子的学院派评论家们不能只认可知识分子的批判才是批判,而看不到民间传统中的许多尖锐泼辣的生存智慧与批判精神。文学文本自身是一个复杂的、含混的,体现着巨大个性的生命混合体,批评家在解读文学文本时,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文学表达单一的批判精神。

正因为如此,新世纪最初十年的文学创作(主要是长篇小说)显示出极为复杂、但也更加接近文学本来面目的特点。如果我们把这样的问题换位来看,那么,在我们批评界一贯轻视的更加边缘的小说文类中,或者说在更加年轻的一代作家的流行作品里,是否也可以找出与他们作品的外在形式相反的、而于现实更有批判意义的因素呢?

正是抱着这样的观点,我期待那次国际研讨会上能够出现奇迹,就如在1986年北京举行的新时期十年文学研讨会上出现了一批黑马,发出真正的文学批评的声音。但是我很失望,什么奇迹也没有发生。不知道是新世纪

十年的文学真的不足以产生新的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青年先锋因素,还是青年一代的作家在社会环境的熏陶下变得圆滑而温顺。我当然不是说青年作家们的创作没有足够的新因素,而是这些新的因素并没有成就新的理论力量和审美观念,足以冲击当下的文学主流的审美规范。我希望的是龚自珍所说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但我并不以为,没有挑战就表明没有新的文学因素在成长,事实上是有的,我要说的是像韩寒博客那样尖锐的具有挑战性的言论,在他的言论里似乎能看到青年先锋精神的新动向。还有像一批在文学的边缘领域游走的优秀作家们,如刘慈欣、韩松等的科幻小说,尤其是韩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奇异幻想,充满了对中国现实的了解和嘲讽。也许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与现实的文化主流构成对话以至于挑战,但是这些新的文学迹象如果能够受到评论界的重视和支持,他们和他们的奇异的创作、以及他们背后所拥有的庞大的读者群,都可以有更好的开拓与创新。2010年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红楼梦长篇小说大奖授予台湾先锋小说家骆以军的《西夏旅馆》,应该是一个信号,青年一代的先锋运动有望在新世纪下一个十年中崛起,创造出一派新的文学天地,文学的接力棒将重新回到青年一代的手中。

写于2011年3月1日

目 录

再谈对新世纪十年文学的理解(代序) ...1

第一辑

《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文学理论卷》导言 ...3

批评与创作的同构关系:兼谈新世纪文学的危机与挑战 ...45

做同时代人的批评家 ...66

学院批评在当下批评领域的意义和作用 ...83

文学会使校园变得更美好

——大学文学教育对话 ...96

先锋与常态

——现代文学史的两基本形态 ...107

对中西文学关系的思考 ...129

比较文学与精英化教育 ...135

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之精神基础

——试论勒内·艾田伯的“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 ...147

第二辑

试论《秦腔》的现实主义艺术 ...163

- 再论《秦腔》:文化传统的衰落与重返民间 ...182
- 从《带灯》看“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叙事艺术 ...193
- “历史一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创新尝试 ...207
- 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 ...227
- 站在诺贝尔讲坛上的报告:《讲故事的人》 ...244
- 从巴赫金的民间理论看《兄弟》的民间叙事 ...263

第三辑

- 读曾卓先生的《有赠》 ...285
- 从郁达夫的悲剧说到名家传记中的女人悲剧 ...294
- 关于老舍之死 ...300
- 见证一个美丽而凄凉的灵魂 ...307
- 《黎烈文全集》唤起了历史记忆 ...312
- 跨越的一代知识分子值得我们研究 ...316
- 关于《世纪的回响》 ...320
- 骈体小说研究引出的一些想法 ...326
- 中国先锋艺术研究的一个视角 ...330
- 复杂的叛逆性
- 现代海派文学的特点 ...334

- 文学中的上海想象 ...342
- 文学的上海与经验的上海 ...346
- 工人题材是海派文化的一个传统
——从长篇小说《工人》创作说开去 ...351
- 老唱片:海派文化的重要元素 ...358

第四辑

- 三十年治学生活回顾 ...365
- 编年体文集(1988—1999)新版后记 ...383

跋 ...411

第一辑

《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 文学理论卷》导言*

《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文学理论卷》共分三卷,第一卷为人文的复兴,第二卷为思潮与争鸣,第三卷为作家作品论。我们四人为一个工作小组,王进负责第一卷的文章编选,金理负责第二卷的文章编选,谢有顺负责第三卷的文章选编。我作为项目的负责人,主要工作就是制定每卷的编选提纲,协调各人的工作进度以及审定最后的项目成果。应该说明,参与文学理论卷编选工作的王进,金理和谢有顺,都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在各自研究领域里都有出色的表现。对于这项编选工作,他们都非常认真地投入阅读思考和讨论,最终选出他们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大系”。我充分尊重他们的见识和劳动,只是作为近三十年当代文学的过来人向他们提供了若干建议,做过些微调整。总的来说,这三卷《大系》是三位年轻学者努力工作的结果。

我通读了他们的编选文章和为此撰写的说明内容,基本同意他们对这

*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三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的一部分,共三卷,由陈思和、王进、金理、谢有顺负责编选。本导言第一部分是陈思和根据王进的初稿改写而成,第二部分是根据金理的初稿略作修改,其他部分为陈思和所写。为了保持文章的完整性,这里收录了全文。特此说明。

一段文学史的描述和理解。他们都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对文学和历史都有他们自己的理解方法。文学本来就是通过对未来的影响来呈现其意义的,文学在未来保留的时间越是长久,在未来的阐释越是复杂多样,文学的魅力也就越是显现出来。我特意请了这几位年轻人来参与这项工作,就是为了了解一下,经历了三十年的“文革”后文学,到现在还有多少魅力可以被呈现出来。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开始成长起来的,我对这三十年的文学发展的见证,是与这段文学史同步的,而他们对于这段文学史材料的梳理则是后起的,我们用双重的编选眼光来总结这段文学史,它的客观意义多少可以被立体地展示出来。我们面对文学史,说某某作品或者文学现象在当时产生过积极的意义,这其实并不重要,也不值得去顶礼膜拜,重要的是,这些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在今天的研究者和读者眼里,是否仍然有它的存在价值和理由。

1935年,当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赵家璧编辑策划新文学头一个十年的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时,策划者把理论建设和文学争论分为两大卷,分别邀请胡适和郑振铎编选。从今天来看,这两卷大系的内容是分不开的。“五四”新文学本身是以运动的形式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来,理论是新文学的开路先锋,筚路蓝缕的理论建设过程也是金鼓齐鸣的争论过程。当时的文学论争,不是像后来的20世纪30年代的宗派之争和40年代的政党之争,而是完完全全的新思维、新理论和新观念的开拓,它是通过对旧的传统思维方法、文学理论和文化观念的批判来展现自身的。理论建设本身就是文学论争,所以这些理论在当时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已经溢出了思想文化领域,改变了社会发展的走向。这种理论先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并非孤立的现象。后来有两个历史时期在形式上又重复了这样的情况:一次是1949年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用毛泽东发表于1942年战时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全国文学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来改造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进行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实践。还有一次就是1978年底的思想解放运

动和政治上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首先是在思想领域发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紧接着,文学创作根据实际的生活感受,写出了直面人生的“伤痕文学”,文学理论紧紧伴随着文学创作,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一步一步地推动文学创作。统治了中国几十年的极“左”的政治路线和教条的思想方法终于受到认真的挑战。文学理论又一次充当了思想冲突的晴雨表,每进一步都是争论,以及由争论付出的代价。但是文学、思想、社会生活就这样不可阻挡地发生了巨大变化。

所以,我接受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文学理论卷》的工作时,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九十年前发生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我坚持要把周扬发表于1979年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放入文学理论卷的头一辑,当时是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年,现在已经在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了,回顾这九十年的文学道路,大致正如周扬所归纳的,三个历史阶段,三次思想解放。但每一次的思想先行的含义并不一样:第一次是知识分子刚刚离开传统的庙堂,开辟了一个知识分子面对民众、表达新思想的启蒙广场,他们攻击的对象是已经在崩溃中证明无力担当历史进程的传统文化,他们所向披靡;第二次是国家刚刚建立新的政权,在百废待兴之际用战争经验来建设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它扫荡的是一切被认为不利于新政权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文化,当然,它也所向披靡。而第三次却不是这样的,它是处于国家和执政党刚刚经历了一场自身内部顽疾所致的灾难,正在投石问路,自我清算,企图通过实践来摸索一条走向未来之路之时,既能拯救国家民族于灾难危亡,又要证明执政党具有的自我克服、自我更新的能力。所以,积极创新的思想路线和亟需纠正的思想路线同时存在于执政党内,没有现成的新思想,一切都需要在实践的检验、思想的冲突和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也没有所向披靡的交锋,整个论争过程都是在进两步退一步,或者进一步退两步的反复磨合中慢慢地摸着石子过河。今天,我们要用既成的历史文献来再现这样的复杂过程,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能的,但是到了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特意把关于人文精神寻思的材料移到这一卷的最后部分,除了时间上它

发生比较晚以外,从性质上说,这一场争论终于摆脱了 80 年代的怪圈,成为知识分子和作家自发的关于未来精神走向的表述,理论的落脚点似乎回到了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五四”的余响仿佛又微弱地出现了。学界在评论“文革”后文学时,总是难以判断 90 年代的文学,我曾经把它描述成一种无名的文化状态,与 80 年代的共名文化状态作了对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与国家意识形态共谋了时代的共名,如“五四”、大革命、抗战、建国……,等等,唯有短暂的 30 年代在全国范围有过一时的无名状态,直到 90 年代,真正的无名文化状态才出现,共名开始被消解,再也没有拢住一切的时代主题和共同标准,文学按照多元走向发展变化^①。这个时候,企图涵盖一切文学实践、指导一切文学创作的理论也不复存在了。

一 人文的复兴:为人道主义辩护·文学主体性·寻思“人文精神”

第一卷侧重于基础理论的建设和发展,编选原则是这样——以人文的复兴为主线,抓住两个关键词:80 年代“文学主体性”的理论争论和 90 年代“人文精神”的寻思,然而,当这一人文的精神指归慢慢成为当代文论主题词的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是 80 年代前期思想解放运动所推动的有关人道主义的争执与辩护,其为以后的人文复兴铺平了道路。——我这里用了“铺平道路”一词,是来自我内心的隐痛,确实确实,在那二十五年的文学理论的思潮演变中,为了取得近似常识的一点点进步,许多文学理论家不得不充当了铺路的石子,他们被压碎了自己,换来了未来道路的平坦。然而,我还必须强调的是,即使人文精神在中国当代文论中的复兴经历了艰难考验,

^① 关于“共名”、“无名”的探讨,参见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第三章“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文化状态”,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

但它并不是作为某种外在的异质因素注入当代文论的,相反,人文的当代复兴最初是依仗了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教训中的自我转化,当1978年理论界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这种自我转化就显示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

郁达夫在主编第一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卷》的导言里有个著名的论断:“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①这个论断可以说是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根理论主线,从“五四”初期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到50年代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再到80年代刘再复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表述的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其理论核心是一致的,就是把文学放在人的实践、人的认知以及人的价值的平台上加以考量,使文学与人学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建构当代文学内在的价值标准和精神尺度。但是,文学理论要从传统教条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阴影下摆脱出来,恢复文学是人学的精神内核,绝非轻而易举可以完成。我们看到,当时文学创作领域已经出现了直逼人的精神伤痛的伤痕文学思潮,但是文学理论却严重地滞后,——理论家们还在传统的“什么是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在哪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倾向性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悲剧”等等繁琐概念里兜圈子,理论不敢正视和解说生活中已经大量存在的人的血肉灾难,不敢正视和分析文学作品中已经表现出来的人的精神悲剧,不敢直面人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说明这样的文学理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要激活它而不是简单地抛弃它,没有别的办法,必须注入人的生命活力,只有活生生的血肉之人而不是虚构观念中的所谓“典型”作为理论所关注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意义才会真正发挥出作用,完成理论生命的自我更新。

^① 赵家壁主编、郁达夫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总公司1935年版,第5页。